

黄正德论汉语的分析性和参数理论(上)

原创 2016-05-18 郝琦 语言学微刊

按语

上周三，语言学微刊现代汉语小组推出了文章：

[什么是汉语的类型特征？汉语为什么会这样？——I. Roberts教授讲座记录](#)

文章一经刊出，得到了很多关注和转发。Roberts在讲座中大量引用了Huang (2015) 的内容，二位先生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展现这些观点的全貌，小组成员对黄正德先生2015年的这篇文章*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缩写和整理，以便读者快速了解其内容。

原文共分8个小节，限于篇幅，本期刊出前5个小节的介绍。其中，第一小节是引言部分，介绍了生成语法的语言变异观和“大参数”、“小参数”的内涵，特别指出了语言变异存在限制和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传统所谓“分析”和“综合”的差异；第二、第四和第五小节分别从词汇结构，功能结构和论元结构三个层面论述汉语的分析性，第三小节是对第二小节的句法解释。后三个小节的介绍将于下周三刊出，敬请期待。

1 介绍

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每个人的语法都是一种“语言表现型”（linguistic phenotype），是由“语言基因型”（linguistic genotype）经历后天的经验发展而来的。在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框架中，语言基因型——被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由一系列原则（principles）和为数有限的开放的参数（open parameters）组成，这些参数的值的设定由儿童接触到的基础语言材料（primary linguistic data, PLD）决定。当所有的参数都获得取值时，我们就得到了语言表现型，如英语语法、汉语语法等。语言变异因此是参数变异的结果。

语言变异的研究，无论是从生成语法出发还是从早期的描写语法出发，都发现语言的变异不是随机的，而是有限制的、有模式的。这样的发现让语言学家把语言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如萨丕尔把语言分成分析的 (analytic)、综合的 (synthetic)、复综的 (polysynthetic)，主要依据语言是否用单个的词汇表达复杂的概念。

Greenberg (1963) 的工作也展示出了语言变异有类型化的趋势。

和描写主义不同，生成语法认为变异的类型化是由特定参数的取值造成的。例如，Greenberg发现VO语言倾向于使用前置词 (prepositions)，OV语言倾向于使用后置词 (postpositions)，原则与参数理论认为这是由Head Directionality parameter (of X-bar theory) 设定为head-initial还是head-final决定的。其他的类似的参数还有Pro Drop parameter (Rizzi 1982), Polysynthesis Parameter (Baker 1996), Wh-movement Parameter (Huang 1982)。

以上这些参数都是“大参数” (macro-parameters)，它们决定了一大束语言差异，极大地减少了儿童语言习得中可能的选择。与之相对的是小参数 (micro-parameters)，Borer (1984) 和Chomsky (1995) 认为所有的参数应该归因于并且表述为相关的词汇项 (lexical items) 和功能性中心词 (functional heads) 的差异。最简方案的精神：经验的充分性(empirical adequacy)和理论的简洁性(theoretical parsimony)。大参数在经验的充分性上的缺陷在于无法刻画更细微的差异和类型学上“表现不正常”的语言。

然而，黄正德先生认为，尽管大多数（甚至所有）变异可以归因于小参数，仍然存在由大参数决定的变异模式。

2 现代汉语句法的分析性

2.1 动词和动词短语

黄正德先生指出，现代汉语 (Modern Mandarin) 在VP上展现出了如下特点：

一、高度能产的轻动词，如：

(1) 打鱼(to fish) 打喷嚏(to sneeze) 打呼(to snore) 打哈欠(to yawn) 打油(to get

oil) 打水(to fetch water) 打灯(to use a lamp) 打毛线(to knit) 打麻将(to play mahjong) 打字(to type) 打猎(to go hunting)

英语的名词telephone能够去名词化而被用作动词，而汉语的“电话”不能。

二、假性名词融合 (pseudo noun-incorporation, PNI)。所谓“假性名词融合”，是指这样一类动宾短语 (verb-object phrases)，它们所指称的动作行为在综合性程度较高的语言 (more synthetic languages) 中用简单动词的形式表达。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名词带出了它的同源动词，如：

(2) 捕鱼(to fish) 捉鱼(to fish) 剥皮(to peel) 做梦(to dream) 开玩笑(to joke)

另一类是由动词带出了它的同源宾语，如：

(3) 吃饭(to eat) 喝酒(to drink) 看书(to read) 唱歌(to sing) 跳舞(to dance)

三、没有动词强迫 (verbal coercion) 现象。所谓“动词强迫”现象，即特定的搭配在一定的语境中强迫给出一个动词的解读，如：

(4) John began (reading/writing/editing, depends on context) a book.

(5) a. *张三开始了一本书。

b. 张三开始看/写/编一本书。

四、缺乏简单形式的完结性动词 (simple accomplishment verbs)，即表达完成的事件或完结性需要借助于动结式 (verb-result compounds)、结果义短语 (resultative phrases) 或者致使结构 (periphrastic causative) 等复杂形式。如：

现象1

英语	现代汉语	意大利语
enter/come in	进来/*入	entrare/??venire dentro
exit/go out	出去/*出	uscire/??andare fuori

现象2: 英语有许多动词有“非宾格形式-使役形式”的交替 (unaccusative-causative alternation), 而汉语对应的简单动词只有非宾格形式。

(6) 打破 弄破 踢破

(7) 窗子破了。

对比: The window broke.

(8) a. *张三破了窗子。

b. 张三打破/弄破/搞破了窗子。

以上对比: Zhangsan broke the window.

(9) 张三踢破/推破/压破/敲破了窗子。

对比: Zhangsan kicked/pushed/crushed/knocked the window broken.

五、动词的非终结性 (verbal atelicity)。即汉语的动作动词 (action verbs) 纯粹是指涉行为的 (activity-denoting)、非终结的 (atelic), 而不像英语的动作动词那样可以有内在的终点 (或者说边界)。对比:

(10) a. #John killed Bill several times, but Bill did not die.

b. 张三杀了李四好几次, 但李四都没死。

(11) a. John wrote the letter in 30 minutes.

b. 张三在30分钟内, 就写* (完) 了那封信。

黄正德先生进一步认为, 以Vendler (1967) 的动词分类框架来看, 汉语只有三种基本动词类型——状态 (state)、达成 (achievement) 和活动 (activity), 非没有完结 (accomplishment)。

2.2 名词和其他的词类

一、对可数名词来说, 有数量性的分类词 (numeral classifiers)。

黄正德先生认为, “本”这样的分类词可以称为“轻名词”, 相当于“打”被称为“轻动词”。二者对自己的补足语都有选择限制。

二、方位表达中包含方位词 (localizer) 。

(12) a. They went to John.

b. 他们去了张三* (那里) 。

(13) a. This idea came from John.

b. 这个主意是从张三* (那儿) 来的。

(14) a. Bill stood at the table.

b. 李四站在桌子* (旁/上/下/后/前) 。

三、汉语有显性的积极义的程度标记 (overt positive degree marker) “很”，可以称之为“轻形容词”。

3 分析性的句法解释

为了与Lexical Parameterization Hypothesis of Borer (1984) and Chomsky (1995) 保持一致，黄正德先生认为参数差异可以归因于一系列半词汇性的轻成分 (semi-lexical light categories) 。

最简方案认为，句法操作由以下原因驱动：语言中存在一些“有缺陷的”词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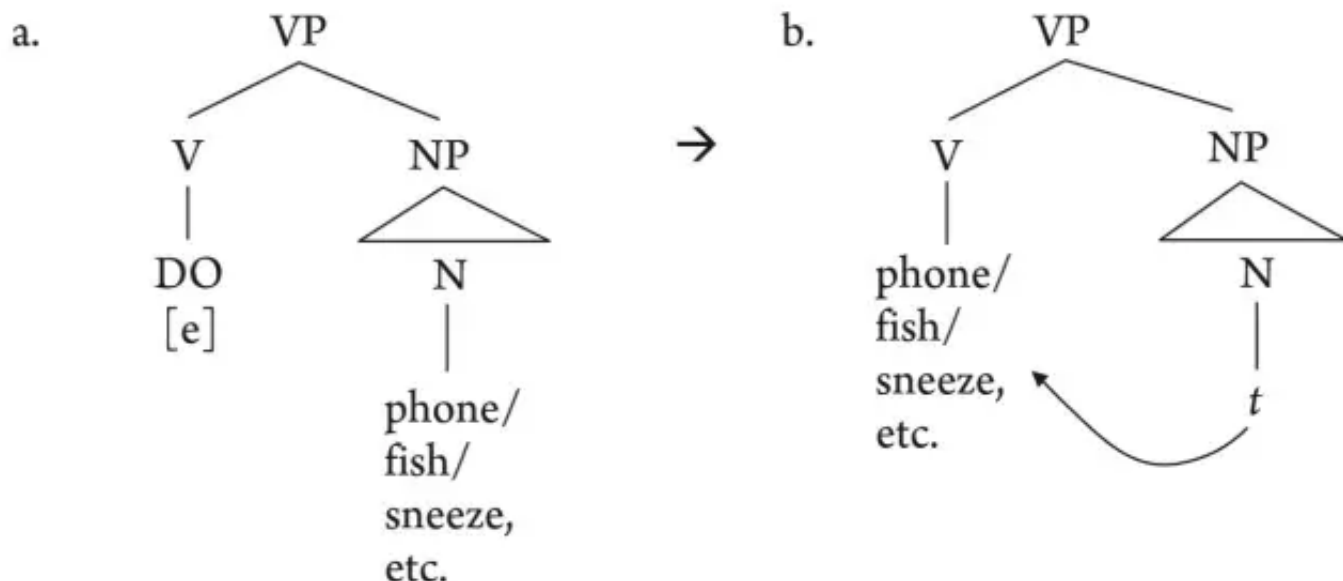
(defective items)，之所以有缺陷，是因为它们包含一些（语义上或语音上）不完全可解 (not fully interpretable) 的语法特征，因此需要一些句法操作来进行允准

(licensing)。一个[+strong]的特征F意味着较强的缺陷，需要通过中心词移位

(head movement) 允准；一个[-strong]的特征只需要通过一致关系 (agreement) 允准，或者让移动延迟到逻辑式 (logical form, LF)。另外，一个有缺陷的中心词可能包含有[+EPP]特征，要求一个XP移动到它的Spec位置。总之，语言会在特定的词项是否包含[+strong]、[+EPP]上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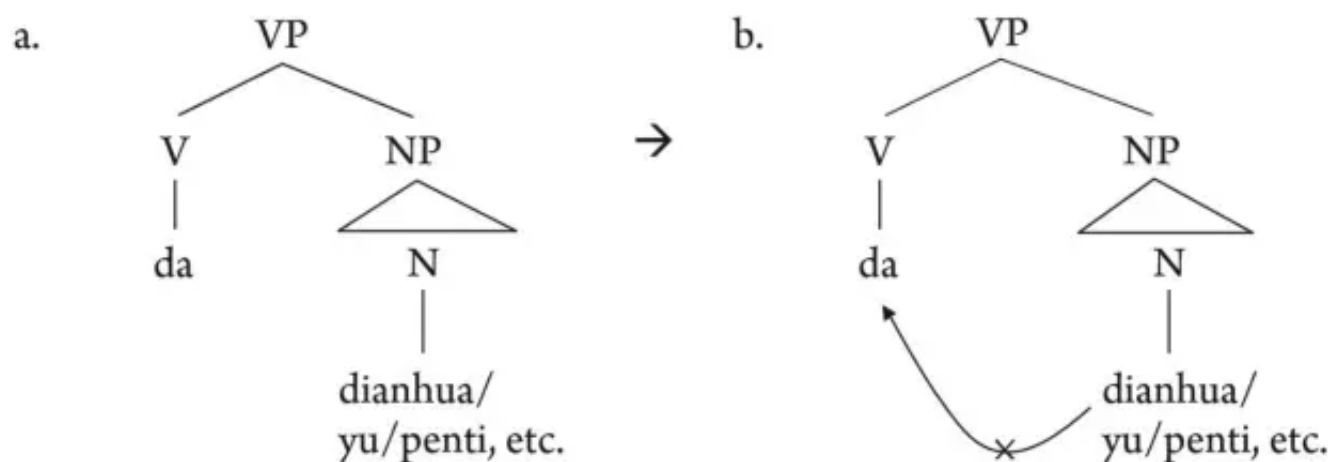
根据Hale and Keyser (1993,2002), 英语的简单动词*phone* (或*fish, sneeze*等) 有如下复杂结构: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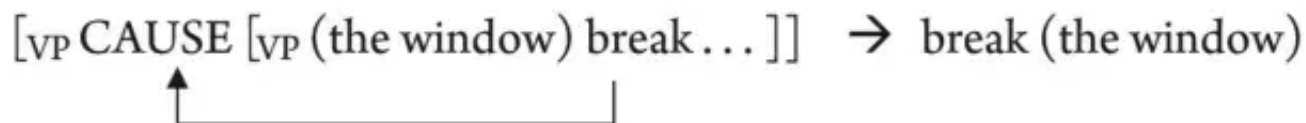
这里的轻动词DO具有[+strong]特征。而在汉语中，我们有相应的显性轻动词“打”，不具有[+strong]特征，因此不会触发移动，只会触发一致（即上文所说的选择限制）：

(16)



致使-完结结构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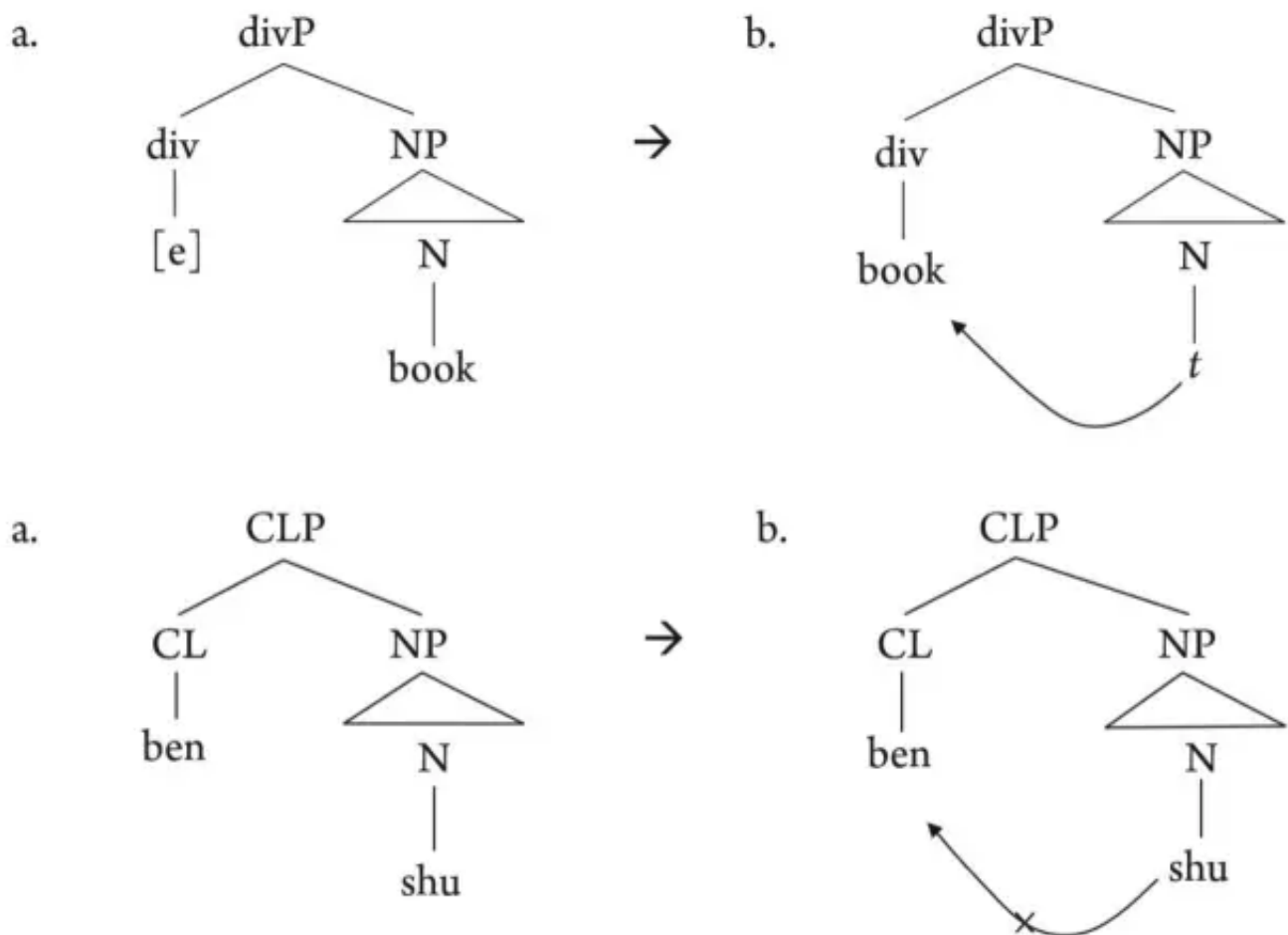
(17)



汉语的CAUSE实现为了显性的“打、弄、搞”，因此阻隔了移动。

名词性成分也可以采取相同的分析。根据Borer (2005)，我们假设可数名词从包含一个起到个体化作用的中心词 (individuating functional head) 的结构中派生而来，这个中心词我们称之为divider head。在英语中，这个divider head在语音上为空，从而触发移动；而在汉语中，在相同的位置我们有显性的分类词，因此阻隔了移动：

(18)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分析方位短语 (Localizer Phrase)。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心词移位带来了综合性，不移位则保留了分析性。汉语是一种“Davidsonian language par excellence”，因为汉语把一个复杂谓词的所有成分都进行了显性的编码。

4 功能性句法 (Functional Syntax) 中的分析性

汉语在句子层面的功能语类 (T、C) 上也表现出了分析性。

一、汉语是 *wh-in-situ* 语言。

英语有 *wh-movement*, 而汉语是 *wh-in-situ* 的情况。Cheng (1991) 认为汉语的 *in-situ* 的策略可能和汉语有显性的疑问小品词 (overt question particle) (如“呢”) 有关。英语的空 C-head 具有 [+strong]、[+EPP] 特征, 所以可以触发 auxiliary inversion 和 *wh-movement*。而汉语的 C-head 具有 [-strong]、[-EPP] 的特征, 因此 *wh* 词保留在原位。

另外一个相关的现象: 英语的 *wh* 词可以和量化性成分结合, 如 *somewhat*, *somehow*, *somewhere*, *whatever*, *whoever* 和 *wherever*, 每一个词都包含一个存在算子或是全称算子 (*some-* 和 *-ever*)。另外, Tsai (1994) 认为, 英语的 *wh* 词是无歧义的 (疑问义), 因为它们都包含一个隐性的疑问算子作为它们词汇语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上面这些英语的 *wh-items* 由名词词干 (noun terms) 和量化算子 (quantificational operators) (即 *some-*, *-ever* 或隐性疑问算子) 合并而成。对于汉语来说, *wh* 词的语义本身是不确定的, 要由它所在的量化结构来确定: 如“谁”在“好像有谁动了我的东西”中表存在义, 在“谁都没来”中表全称义, 在“谁来了呢”中表疑问义。黄正德先生认为, 英语的疑问词是连续的 (因此是综合的), 如 *who*; 而汉语的疑问词是不连续的 (因此是分析的), 如“谁...呢”。进一步, 英语的疑问词在词库中就已经形成了, 而汉语的疑问词要在句法操作中才形成。疑问词形成的时机的不同, 直接导致了 *wh-movement* 的时机的不同。

二、英语中有 *what the hell*, *why on earth* 这些结构, 而汉语中只有“不连续的”相应的表达。Pesetsky (1987) 指出英语的这种结构有如下特点: (a) 它们必须以单独的连续的成分出现; (b) 它们必须出现在 [Spec, CP] 的位置:

- (19) a.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y on earth are you still here?!
- b. *What are you doing the hell?
 *Why are you still here on earth?!

- c. *Who saw what the hell?
(cf. Who saw what?)

汉语中类似的表达由一个副词性的“到底”和一个由它c-command的疑问成分组成：

- (20) a. 张三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来?
b. 你到底明天去不去?

Huang and Ochi (2004) 认为，“到底”、*the hell*、*on earth*这类成分位于Attitude Phrase的中心语位置，c-command一个*wh*词。英语的Att-head具有[+strong]特征，因此吸引了*wh*词移位并与之融合。而汉语的Att-head具有[-strong]特征，因此只需要与*wh*词保持一致关系即可。

三、英语有否定量化词 (negative quantifiers)，也有“相互代词” (reciprocal NP)，还有一种称为“binominal-*each*”的结构。英语中这些表达表现为单个的成分，同时也存在非连续的选择：

- (21) a. John did not see anybody.
b. John saw nobody.
(22) a. They each criticized the other(s).
b. They criticized each other.
(23) a. They each ate three apples.
b. They ate three apples each.

在汉语中，只有非连续的（分析的）形式可以被接受：

- (24) a. 张三没有看见任何人。
b. *张三看见了没有人。
(25) a. 他们各自批评了对方。
b. *他们批评了彼此。
(26) a. 他们各吃了三个苹果。
b. *他们吃了各三个苹果。

黄正德先生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在人类语言中*nobody*或者*no book*中的*no*往往是由*not any*发展而来的（有来自挪威语的证据）。这条规则叫做‘*not any --> no*’rule。因此，对于有V-to-T movement的语言（即T有[+strong]特征）来说，*not V any N*会生成*V...not any N*，从而让‘*not any --> no*’ rule发挥作用。

四、汉语没有V-to-T movement还能从汉语的语序中看出来，因为汉语的动词永远在副词和否定词之后，呈现出“Subject-Adjunct-Verb-Complement”的语序，我们把这种语序称为“Kaynean word order par excellence”。这种语序符合Huang（1982,1984）提出的Postverbal Structure Constraint (PSC)，即汉语的动词后只允许一个成分。

不过我们需要指出，虽然汉语没有V-to-T和T-to-C movement，但汉语有V-to-V movement和V-to-v movement。V-to-V movement表现在双宾语结构中（采用Larson 1988的分析）：

(27)

V-to-v movement如：

(28)

五、汉语没有canonical gapping的现象：

- (29) a. John eats rice, and Bill spaghetti.
b. *张三吃饭，李四面。

我们采用Johnson (1994) 的分析:

(30)

其中 μ 是IP region (在T和v之间) 中的功能性中心词。这进一步证明了汉语没有V-to-I movement。

5 论元结构中的分析性

在论元结构层面, 我们也能看到语言有“分析/综合”的区分。

一、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差异和我们上面讲到的*nobody*, *each other*等的分布类似 (即句子层面的副词性的*not*或*each*可以或不可以在一个名词性结构中充当修饰性成分), 请看下面的对立:

- (31) a. Jennifer types fast, Dorothy drives fast, etc.
b. Jennifer is a fast typist, Dorothy is a fast driver, etc.

对比汉语:

- (32) a. 张三是一个 (打字) 打得很快的打字员。
b. *张三是一个很快的打字员。

类似地, 下面这句英语例句有歧义, 可以表达这个歌手长得很漂亮, 也可以表达这个歌手唱得很好 (相应的汉语表达没有这种意思):

- (33) Jennifer is a beautiful singer.

为了得到这两种解读，汉语的“漂亮”必须分别跟名词和动词组合：

- (34) a. 阿美是一个很漂亮的歌手。
b. 阿美是一个唱得很漂亮的歌手。

这些英语例子展示了一种sub-lexical modification into parts of a noun的现象，也就是说*fast*修饰*driver*中*drive*部分，*beautiful*修饰*singer*中*sing*部分。Larson (1998) 认为英语中的一些名词在它们的论元结构中包含一个事件论元 (Davidsonian event place)，也就是说，*singer*指称一个“事件-个体”偶 (event-individual pair) $\langle e, x \rangle$ ，在语义上可以拆解为Singing (e) 和Agent (e, x)，上述歧义源于*beautiful*既可以是对e的陈述，也可以是对x的陈述。

英汉的上述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语言中词汇项的相对复杂度。

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语的结果式 (resultatives) 存在Direct Object Requirement (DOR)，即结果小句必须是对主句的宾语的陈述：

- (35) a.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b.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tired.

对主语进行陈述的情况只出现在表被动 (passive)、表起动 (inchoative) 或者非宾格的 (unaccusative) 的句子中，这些句子里主语都约束一个宾语位置的语迹：

- (36) a. The metal_i was hammered *t_i* flat.
b. The garage door_i rumbles *t_i* open.
c. The river_i froze *t_i* solid.

DOR规则自然就排除了带有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 (如*cry*或*run*) 的结果式，并且解释了这些例子中对“傀儡反身代词”(dummy reflexives) 的需要：

- (37) a. *John cried silly.
b. *Bill ran exhausted.

- (38) a. John cried himself silly.
b. Bill ran himself exhausted.

而汉语的非作格性的结果式不需要傀儡反身代词：

- (39) a. 张三哭得很累。
b. 李四跑得满身大汗。

另外，汉语的包含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的结果式可以被致使化（may be causativized）：

- (40) a. 这件事哭得张三眼睛都红了。
对比：*This thing cried Zhongsan red-eyed.
b. 报纸看得李四头昏眼花。
对比：*The newspaper read Lisi dizzy.

英语中只有非宾格的和表起动的情况可以被致使化：

- (41) a. The door rumbled open.
b. John rumbled the door open.

(42) a. John got angry.
b. He got John angry.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汉语允许非作格结果式及其致使形式，而二者在英语中都不被允许呢？

Huang (2006) 认为，(39) 中的例子并不是非作格结果式，而是非宾格/起动结果式，因此，它们同(36)中的例子一样遵循DOR，并且可以被致使化。在这里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这个动词性的黏着词（verbal clitic）“得”，和英语的*get*一样（见(42)），其意义也在“become”和“cause”之间交替。也就是说，“得”是中心语，拥

有起动义 (inchoative meaning), 但在音系上不自足, 需要一个表达变化的方式或来源的非作格动词的支撑: (39a) 表示张三从哭中“得”到/变“得”累, (39b) 表示张三从跑步中“得”到/变“得”满头大汗。并且当一个致使性的成分加在起动性成分之上时, verb-*de*的移位会跨越经历者“张三”, 得到 (40) 中的致使式。

从而问题归结为: 为什么英语的结果式不能作相同的分析? 我们的答案是这又跟两种语言的综合性-分析性上的差异有关。在英语中, 对应于汉语的“得”的成分是一个空的轻动词BECOME或CAUSE, 它们具有[+strong]特征, 吸引一个在题元特性上与其保持一致的动词, 因此, 下游的动词只能是非宾格的或表起动的, 也只有这些动词能用于致使化的情况。

三、另外, 汉语在论元结构方面展现出了如下特色:

(43) 开车; 开高速公路; 开左边; 开晚上; 开好玩
吃饭; 吃饭馆; 吃筷子; 切肉; 切这把刀

在上述例子中, 一个及物动词可以带一系列非题元要求的宾语, 造成了句法语义的错配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类似的表达在英语中是不允许的。Lin (2001) 认为这一差异源于论元结构的相对分析性的差异。在英语中, 谓词*put*在词汇层面就带有一个论元结构<Agent, Theme, Location>, 因此它只能进入一个非常固定的句法位置; 而在汉语中一个谓词进入句法运算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论元结构, 因此展现出相当可观的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有时移位至隐性轻动词的位置, 从而带一个附加语 (adjunct) 作为它的宾语:

(44)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 英语的隐性轻动词必须有一些形式特征来触发基于特征一致 (feature-agreement) 要求的动词词根移位, 而汉语的轻动词不包含这类[+strong]特征。因此, 汉语中的上述移位发生在语音式(Phonetic Form, PF)层面 (因音系层面的需求而移位), 因此不会带来任何语义上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的高度分析性表现在几乎每个语法层面：词汇结构（lexical structure），功能结构（functional structure）和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从而导致汉语拥有显性的Davidsonian syntax, canonical Kaynean word order和一系列明显的句法-语义错配。

参考文献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p. 1-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ker, Mark. 1996. *The Polysynthesis Parame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er, Hagit. 1984. *Parametric Syntax: Case Studies in Semitic and Romance Languages*.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Borer, Hagit. 2005. *In Name Only*. Structuring Sense,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g, Lisa Lai-Shen. 1991.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Universals of Grammar*, ed. Joseph H. Greenberg, 73–11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ed. K. Hale and S. J. Keyser, 53–10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 Keyser. 2002.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uang, C.-T. James. 1982 [1998].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Published in 1998 by Garland Publishing.)

Huang, C.-T. James.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53–78.

Huang, C.-T. James. 2006. Resultatives and unaccusatives: A parametric view.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53, 1–43.

Johnson, Kyle B. 1994. *Bridging the Gap*.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1.

Lin, T.-H.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Pesetsky, David. 1987. Wh-in-situ: Movement and unselective binding.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ed. Eric Reuland and Alice ter Meulen, 98–12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izzi, Luigi. 1982. *Issues in Italian Syntax*.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撰写：郝琦

编辑：赤玉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